

序跋精萃

前不久收到张霖女士给我寄来张晖的《龙榆生先生年谱》，遂浮现往事。2002年夏我来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张晖也刚入学读博士。在办公室初次见他，谦谦有礼，言谈敏捷新锐，给我很深印象。他给了我一本《龙榆生先生年谱》，是他在南京大学读文科强化班四年的作品，愈使我觉得人才难得。想不到他在2013年3月突然因病去世，英年早逝，令人徒生“文章憎命达”的感慨。这本年谱虽属少作，出版后广受赞誉。此为“增订本”，据《后记》，张晖的同事学弟倪春君受张霖之托，依据张晖生前所拟定的增订版蓝图删改、增订而成。

我的一些随笔文章属于学问方面的收入《凌波微语》一书，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偏重文艺方面的收入《午后的繁花》，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这本《风义的怀思》较为特别，收入十一篇文章属追忆、悼念性质。所追念的都是我的老师、学生或朋友，除了《金庸的折叠江湖》这一篇，我与金庸先生没有交往，大约因为章培恒师对他的小说十分喜欢，故应邀而作。面对这些文章，我心头涌起感恩与追怀之情不能自己。回顾平生逶迤踟蹰于学文教书之途，至今工龄也有四十年了。早年就读过韩愈的《原道》《师说》之类的文章，然而一路上如果没有良师益友的耳提面命、爱抚关照，就谈不上对古训有一番感同身受的体验。当然另一方面，想当年像我那样，照从前的说法不过是一介寒士，也曾蹉跎岁月、遭遇曲折，如果不是碰上昌明开放的年代和勇于拨乱反正的师长们，就是另一种人生了。好像最近听谁说过，与其靠才学更不如靠运气，我不知对不对，只觉得悲哀。

陈寅恪先生的《王观堂先生挽词》有“风义生平师友间”之句，书名取“风义的怀思”不敢说师门宗风，借此对幸能亲炙的前辈学者表达崇拜与礼敬，也有意与同道们矢志薪火传承而共勉。这也是为何我收到《龙榆生先生年谱》时产生的感动。所谓“风义”，在我的理解，风也者，指风尚、风骨与风化，关乎风气的熏染与影响；义也者，指义利之辩，涉及道义精神与侠义担当。试想倪春君与张晖素未谋面，但倾力相助，我想这不光因为师友相托与同门之谊，也是因为把“风义”作为人文传统而加以尊崇之故。

# 生命定格在美好的瞬间

陈建华

我们对明天过于慷慨，总以为还有机会，其实不然。

信上日期是1982年6月19日，当时我大约忙于毕业，结果没寄出去，这封信一直留在身边。四年前为纪念景深师写了怀念文章，也没提这件事，压根儿忘了。今天捧读此信，最后一段说：“夏写时先生是所佩服的中国古典戏曲理论批评家，虽然年轻，但成就很高；陈建华是我的研究生，他写的驳论是他自己有此看法。希望您能支持更年轻的一代。事理当为越辩越明。我这些简单的话也只是供您参考。欢迎您删去陈建华文中不当之处。祝好，赵景深。”读来一股温暖流注，眼前浮现先生的慈霭面容，这么挺学生好像有点打抱不平，其间若有一股侠气。

该做的没做，该记得的又忘了，于是人情文债两亏欠，想想事出偶然，也就释怀了。我不善怀旧，然时不时挂在心头的，譬如安耀华老师，七十年代跟他学英语，这些我在书里写过。看到他的两封信，用英文写的，那时我在美国，说他已入老境，语气豁达如故，却关心着我的状况。2000年暑假我回国，和安老师、小伍与老姚聚在一起。翻来翻去，只有他的相片，也有他和小伍的，怎么没想到和他合影？我责怪自己的疏忽，没想到那是最后一次见他。后来在香港工作，打电话给他女儿阿丫头，说安老师已不在了。

我们对明天过于慷慨，总以为还有机会，其实不然。想起叶笑雪先生就感到歉疚。1998年暑假我回国与吴格兄一起去看望叶先生，他已知觉模糊不能言语。接着我去了郑州，在大哥家住了两个礼拜，回来他已走了，追悼会也开过了。我和叶先生是忘年交，1988年我出国，他住进我的复旦宿舍，照看我的书籍，把它们编目，一条条抄在纸上寄给我。每次写信都事无巨细写得密密麻麻。两年后宿舍给复旦收回，叶先生在搬出前把我的书装了四五十个箱子，和我的同门兄弟们一起把这些箱子运到古籍所，直到2013年我回到上海之后兄弟们又把这些箱子运到我在市里的寓所。

的确，平生所交不乏古道热肠性情中人，使我感发，在记忆中闪亮。每次见到吴格兄，就替自己难过。叶先生精

通文史，学贯三教，曾担任李亚农秘书，因生性孤直而遭打击吃苦头。在复旦时已年届古稀，吴格与他甚为莫逆，常与他讨论学问，在生活上照料他。在他身后吴格为整理与出版其著述不遗余力，《徐森玉年谱》手稿本已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谢灵运诗集》也将由复旦出版社出版。这令我非常感佩。

张爱玲说她小时候一个人在花园里一边跳舞一边唱：“一天又过去了，离坟墓又近一天了。”那当然是“童言无忌”。但是在她晚年写的《对照记》里说：“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听上去就“寒丝丝”了。我在《紫罗兰的魅影》一书的自序中提到一些应当致谢的师友，结果屈指一数十余年里已经作古的不下十位，心想一一列出来不免吓丝丝，因此最后写道：“书至此，不禁心头茫然。文中提到的几位前辈长者已奄然长逝，不一道及，他们的著述与精魂永在，储于我心影。所谓人生苦短，世道亟变，仅愿留存当下，珍重眼前，与大家共勉。”序文署写的日期是在2015年5月25日，而该书在去年出版时，范伯群先生和赵昌平先生先后仙逝。一时没写文章，因为《凌波微语》一书的出版需要一篇自序，于是写了两段话以志悼念。

王羲之《兰亭序》中“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之句为人传诵，宇文所安先生在《追忆》一书中认为这句话代表了中国文人对传统的信念，其中“记忆”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当然是指文学经典而言，否则谈不上传承的意义。我对于自己所写的不存奢望，许多属于时过境迁的东西，但是古人说：“慎终追远”，纪念往圣前贤是中国人的传统，为的是尊重生命，为现世与将来的福祉祈愿。诉诸文字的纪念固然具有某种仪式的意义，正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借一瓣馨香以通灵，也即“精魂永在，储于我心影”的意思。

从前写《兰亭序》，练字而已。现在年越老，越觉得它像一篇悼文，时代的隐痛渗透进生命之中，方能领悟生死，珍惜当下。至此不禁悲从中来，恕我一吐为快。去年，这场疫情之前我已痛失两位——二月里我的大哥，八月里

我的好友孙绍谊兄，先后离世。一样的病，都是早年埋下的病根，再三辗转于同样的两家医院，老天难回，悲夫痛哉！在病床边，大哥说了几句只有我能明白的话，无非伤心话，我只握着他的手，千言万语欲恨喉间，诉不尽风雨手足情。与绍谊兄的相识是上世纪末在夏威夷的亚洲年会上。君子之交难得是相知，近些年我回到上海，他执教于上海戏剧学院，来往愈多，好像我们还在一起畅游西湖，一壶浓茶正在慢慢泡开，却走了，六十岁还没到。

疫情尚未结束，生意已在蠢蠢欲动。二二个月里与朋友们约了数次饭局。去年我问吴格是否认识张荣明，几十年没见了，我俩都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认识叶笑雪先生的。吴格说认得，就爽然定了见面的日子，因为疫情拖了半年多。上月里我们终于聚首，叙旧也怀旧，我与荣明回忆曾去虹桥拜访叶先生，那一带还荒凉得很，叶先生住在一间茅屋中，与他女儿做饭招待我们，面盆里煮了许多鱼。另一次饭约是与几位出版人一起，谈起昌平兄。又一次是与上戏的朋友们，自然谈到绍谊兄。又一次跟我的中学里同学杨幼松，睽违半个多世纪了，说起我们当年做过的捣蛋事，笑得像昨天一样开心。他还能记得全班谁是第几号，坐在第几排，我旁边坐的女生叫什么。我跟安老师学英文，就是他的姐姐介绍的。说起我常陪安老师喝酒，阿丫头做的红烧肉。我问他能否联系上阿丫头，想知道安老师葬在哪里，几时可以去他的坟头烧一炷香。我看着我，又避开我的目光，然后说阿丫头前几年已经故世了。

这次疫情如此凶猛，一下子我们与死亡靠得这么近。而饭桌上谈笑风生，大家仿佛从压抑中解脱出来，享受舌尖之美与生之欢快。说奇怪也不奇怪，都是相熟的朋友，会聊起相熟的逝者，当然聊得更多的是生活中的现实，其严峻的程度不亚于疫情。在对逝者的钦佩与怜恤之中分享着友情与诚信，对工作的热情与理想的追求，其实在分享着价值的认同，无非是希望现世的安稳与美好。当大家谈起逝者是那么自然，他们的音容笑貌宛如眼前，其实生死之间仅

一板之隔，他们好像就在近旁，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

一天手机电话铃响，一时没接听就挂断了，屏幕上显示“大哥”两字。瞬间里我头皮发麻，事后知道是嫂子打来的。我不信鬼神，却突发奇想，或许大哥真的会从另一个世界来电，那我们能聊聊天鬼世界，岂不有趣？这臆想可笑，不过怎么说呢？有人说我们已进入“后人类”时代，新媒体、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模式与日常生活习惯，关于人工智能时代必然来临的预言不绝于耳。简言之，我们生活在真实与虚拟的世界中。有趣的是，或许是看多了魔幻小说和电影，我在一首诗里描写某天在衡山路上蒲吧，接到我妈从阆间发来的微信，叫我提防一起喝酒的人是个骗子。当然这是文学虚构，但对我来说首先得意识到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否则谈不上明辨是非真假。就像对待这次新冠病毒，如张文宏医生所告诫的，要做好与病毒长期共存的心理准备。

看到绍谊仍在我们的朋友圈里，不免会产生一种魔幻之感，油然想起他所研究后人类理论的专著以及他所组织的世界后人类电影研讨会，而翻看我们之间的私信记录，往事历历在目。令人难忘的是绍谊好酒好客，逢年过节会邀请他的同事、朋友与学生在他家聚会，拿出从美国加州带回的上好红酒，而他自己则因病不能喝酒，见大家尽兴而高兴。我也会在微信朋友圈里发文晒图。一次是在他家吃蟹，另一次是2017年年末末上川兄邀请绍谊与我去南京艺术学院观赏他从日本携回的民国电影《风雨之夜》。我们游览南京故城，在城头上绍谊看见地上一根竹竿，两头系着大红灯笼，他举起竹竿豪爽大笑。我把这张照片发在朋友圈里，并作打油诗曰：

蟹友笑趴金陵城，  
横扫灯笼堪称霸。  
倦游穿越后人类，  
归来兰郢解豆芽。

诗后附几句说明：“吾等一行畅游金陵城头，曾于孙府吃蟹，属践行‘蟹友’也。绍谊举灯笼，霸气四溢，一如其新著横扫二十一世纪‘后人类’电影理论。未句谓绍谊年年零点好莱坞，占卜奥斯卡奖项十不离九，若有神助。”

两年之后绍谊离开了我们，他的生命却永久定格在美好的瞬间，给我们留下久久难以平复的回忆。

（本文为浙江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风义的怀思》自序）



## “三绝碑”往事

张瑞田

站在柳子桥眺望柳子庙，感叹古建筑知识的贫乏。这是怎样的一座建筑呢，色调清冷，结构奇特，走过许多地方，未见雷同，觉得柳子庙个性鲜明。有四级台阶，引抵庙门，门上方镶嵌着长方形的黑色石板，中间有“柳子庙”三个大字，特别的“颜筋柳骨”。“柳子庙”三个字的四周，是凸出的精美雕刻，上端是一支昂首的瑞兽。再往上看，更奇，还是两个活灵活现的瑞兽，头挨着头，站在庙门的顶端，直视前方。从它们头顶越过的是一月牙形凌空悬的屋檐，空灵、玄虚、缥缈。“月牙”的中心，盘着两条各望东西的蛇，两条蛇的中间，立着色球叠成的小塔，塔尖低于“月牙”的两端。

永州，柳子庙，未等步入，眼前的景象，就让我思绪飞扬起来。读韩愈《柳州罗池庙碑》，也有空灵、玄虚、缥缈的感觉，直观韩愈是如何用文字描写了柳宗元从人到神的过程。他告诉我们，在柳州担任刺史的柳宗元，与百姓和睦相处，施以礼法，于是有了官民相悦的现实。老百姓收入提高了，官府税收也有了保证。于是，“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鸡鸭，肥大蕃息”，父子情深，夫妻恩爱，婚嫁嫁娶，按部就班。同时，修建孔庙，植树修城，“柳民既皆悦喜”。在韩愈的文章中，我看到了唐代的扶贫模范。后面更有意思，穿越亦悬疑，韩愈笔下的柳宗元对部将说：“吾弃于时，而寄于此，与若等好也。明年吾将死，死而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果真，三年之后柳宗元死了。当年七月，柳宗元的灵魂降临柳州官衙，深夜，托梦欧阳翼“馆我于罗池”，也就是说，在罗池为我修馆舍。欧阳翼、魏忠、谢宁等部将迅速行动起来，以最快的速度建好罗池庙，并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一位名叫李仪的不速之客喝大了，在庙堂上出尽丑态，即刻生病，蹒跚走出庙门，伏地而死。

起伏跌宕，人鬼情未了。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魏忠、欧阳翼派谢宁到京师，请韩愈撰文刻石。“余谓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之，以食其土，可谓灵也”已，于是，韩愈写了这篇文章，同时作《迎享送神诗》，送给柳州百姓，祭祀时吟诵，同时刻碑以铭。“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侯之舫兮旌旗，度中流兮风泊之待……”文辞古雅，仿《楚辞·九歌》体而成，描写迎神的场面，柳州百姓的心情，也描绘出“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侯朝出游兮莫来归，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的优美景色，希望柳宗元永远造福柳州百姓。

《韩昌黎全集》收有《柳州罗池庙碑》的全文，他以古厚高绝的楷书，书写了《迎享送神诗》，“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因第一句有“荔子”二字，后人便以“荔子碑”称之。苏轼敬仰柳宗元，晚年被贬，以吟诵柳文、陶诗言志。或许，柳宗元颠沛流离的一生，让他生出几多感慨。因此，他应邀书写《迎享送神诗》，带着深深的情感，一笔一笔地写，墨稠锋健，掷地有声，给中国书法史留下一篇杰作。朱熹以“奇伟雄健”誉之，王世贞则视为“天下第一碑”。我读过“荔子碑”，感受到此碑的深度与强度，觉得二公所言不虚。

传说有了，这块立于罗池庙中的碑，因“柳事韩文苏书”，被称为“三绝碑”。尽管还有一些知名的碑刻也有“三绝碑”之称，不过，从人文渊藪中看去，“柳事韩文苏书”更有绝佳的精神气象。

登上一级台阶，又登上一级台阶，站到柳子庙的门前了。两侧各立着一座石狮子，石狮子左右，依次是两棵挺拔的松柏，树干碗口一样粗，树冠向上收缩，绰约多情，宛如两位相思的湖湘妹子。在门口停留几分钟，回望一眼柳子桥，平息一下起伏的心情，进入柳子庙。开始，觉得头顶有压抑感，再向前走，就是一级台阶，到了平缓处，回头一看，恍然大悟。原来，在柳子庙门前所见的月牙形屋檐，是戏楼的屋顶，从正面看，有三层屋檐，两端翘起，浪漫、飘逸。那个色球叠成的小塔，在戏楼屋顶的正中间，神秘莫测。

柳子庙是歇山顶式砖木结构的古代建筑，三进三开，上下衔接，曲径通幽。第三进是正殿，柳宗元端坐、握笔的大理石塑像，让人想起柳宗元坎坷的一生。塑像的一侧有“利民”二字，门檐上悬一块木匾，上书“文冠八家”四字。我在柳宗元的塑像前伫立，默默看着他手中的笔，就是这支笔，在贬逐的道路上写了多少忧患天下、寄怀苍生的文章啊。

在京城任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因朝廷改革派失势，遭到清洗，805年，被贬为永州司马，815年，接诏书回京，再一次深陷政治泥潭，未能重用，改贬柳州刺史。819年辞世。永州司马王，柳州刺史4年，因政绩卓著，得到两地百姓的爱戴。柳州建罗池庙，后改为柳侯祠，永州则建了柳子庙，也就是我现在驻足的地方。

离开柳宗元塑像，回到二进院的中殿，东行，在一面墙上看到一些石刻，最耀眼的当然是“荔子碑”。柳子庙里的“荔子碑”为四块长方形青石，手艺高超的雕工把苏轼书写的《迎享送神诗》刻在上面。第四块青石，有清代永州知府廷桂留下的跋语，读后，恍然明白，四块青石连缀而成的“荔子碑”，不是南宋嘉定十年刻立的“荔子碑”，那块历经沧桑的碑，还在柳公祠。

面对“荔子碑”，情不自禁地吟诵起来：“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渐渐的，眼前的“荔子碑”一点点深暗下来，本是白色的青石，暗了一层，又暗了一层，朦胧中叠映出我在柳公祠见到的“荔子碑”，那是初刻，也是历经磨难，坚韧挺拔。应该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第一次造访柳州，自然要去柳公祠谒拜。写文章或喜欢读文章的人，都知道柳宗元的分量。在柳公祠，拜观“三绝碑”，碑上的字有拓片流传，是学习书法的范本，自然不陌生。如此近距离地看，心潮起伏，就如同偶像突然出现在面前，惊喜、惶恐也会一并而来。“荔子碑”高达231厘米，宽129厘米，10行，每行16个字，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苏轼的“荔子碑”成为文人士夫的宝爱，碑拓在市场流通，有一拓难求之势。徐霞客于1637年6月游历柳州，他在日记中写道：“又西过唐二贤祠，见拓碑名家，市所拓苏子瞻书韩碑二纸。更觅他拓，见有柳书《罗池庙碑》一方，笔劲而刻古，虽后已剥落，而先型宛然。”此前，“荔子碑”从柳公祠中失踪，“亦因兵燹中毁弃，后筑外城，军士拾得碑一角以

翻城，城辄崩，因取还，与原碑合”。后来，“文革”危及“荔子碑”，文化人用灰浆涂抹掩盖，又一次幸免于难。碑的命运，也是人的命运。

也许，“荔子碑”在明代一段时间的遗失，引起人们的警惕，于是，开始仿刻“荔子碑”。柳公祠中就有清代仿刻的“荔子碑”，刻工也好，许多流布于市的拓片，就是这块碑石的翻版。

深爱“荔子碑”，在柳子庙与它面对面的时间有一点长。通读一过，感受到苏轼楷书的笔势顿挫、旷达沉逸，法度虽说谨严，宋人尚意书风的横溢神气一目了然。对韩愈《迎享送神诗》和苏轼的书法有了从生到熟，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早就发现，苏轼书写韩愈诗作，有些微出入，比如“杂肴蔬兮进侯堂”，漏掉“蔬”字，而“侯乘驹兮入庙”，他却加上一个“白”字，“慰我民兮不啖以笑”，写成了“不啖兮以笑”，“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写成了“秋与鹤飞”。这是苏轼的笔误吗？应该不是，他记忆力超强，何况又是书写自己敬仰的先贤。那是他对韩愈诗文的加工吗？或许是，他“误书”后的文辞，不伤本义，也没有语病，多了绰绰韵致。看来才高八斗的人在什么时候炫技都有彩头。

永州柳子庙中的“荔子碑”，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仿刻的。我看看四块青石连缀的“荔子碑”，与初刻的“荔子碑”比较，说不出明显的不同。亦有人格化的“荔子碑”，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在文化存在了。不管古今，不论风雨，它的文章，它的字迹，深入人们的骨髓，幻化为持久的审美力量。

也是因为柳宗元的人格、文才、事功，北宋对柳宗元有了独有的尊崇。北宋仁宗至和三年，开始在永州兴建柳子庙。北宋末年，宋徽宗追封他为“文惠侯”，这也是“柳侯”的缘故。明万历年间，永州司理刘可勤看到“荔子碑”的拓本，即浆湿润，书香扑鼻，即令仿刻，立于柳子庙。这是永州地方官第一次仿刻“荔子碑”。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写了《永州八记》，成为千古绝唱，还写了回答屈原《天问》的《天对》，提出“官为民役”，对永州后来的官员产生影响。清顺治十四

年，湖南分守道黄中通与永州知府魏绍芳捐出俸银，翻修柳子庙，同时，再一次仿刻“荔子碑”，让永州人祭祀柳侯时齐声吟诵。到了清同治五年，先贤仿刻的“荔子碑”漫漶残损，无法观赏。时任永州知府的廷桂得到仿刻“荔子碑”，清晰的碑拓，决定复刻。他研究了“荔子碑”的史料，为避免复刻的“荔子碑”折断或磨损，用四块青石仿刻，并嵌入墙内，让永州的“荔子碑”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时间过去了一百五十多年，眼前的“荔子碑”字口清晰，撇捺传神，魅力无穷。



柳子庙与“荔子碑”